

第五十五辑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追忆孙中山先生若干事

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开展革命运动

孙中山为中国空军奠基

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

程砚秋生平轶事

87
K250.6

7

5:55

第五十五辑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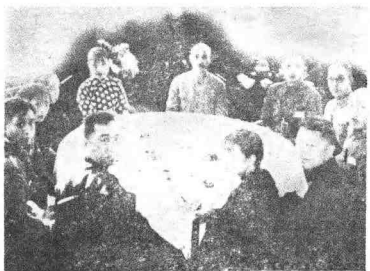
1924/03

—上海人民出版社



B

377530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一九三一年视察湖南，与刘廷芳在宴席上合影（背向摄影机右起第一人为刘廷芳先生）

豫鄂湘三省匪患剿办司令部用殷



蒋介石为推荐刘廷芳先生，写给杨永泰的信



孙中山一九一八年在上海



一九一二年六月孙中山在上海与黄兴、陈其美等欢迎日本友人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韶关宴请苏俄友人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筹办航空
学校与戴传贤、陈英士及飞行员等合影



立者：右起孙毓、宋福龄、孙科、孙延
坐者：孙中山、卢夫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孙中山在广州与亲属等合影



目 录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追忆孙中山先生若干事·····	田 桓(1)
孙中山在旧金山发展同盟会·····	温雄飞(10)
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开展革命活动·····	赵 昱(22)
横滨华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温世华(31)
孙中山和黄克强的革命友谊·····	王弘之(36)
孙中山先生对我家的深情厚谊·····	江俊孙(38)
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的活动·····	任武雄(43)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十三次会晤·····	王耿雄(52)
孙中山的三件重要国际活动·····	亚 英(72)
孙中山为中国空军奠基·····	张建基(80)
中山舰护送孙中山由穗转港北上纪实·····	谢崇坚(89)
孙中山在上海大事记(一九一一——一九二四年) ·····	本刊资料室(93)

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	刘廷芳(121)
-----------------------	----------

——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

我当蒋介石侍从医官的见闻·····	吴麟孙(129)
从事国民党征兵工作的回忆·····	胡次威(137)
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	邓葆光(150)

陈纳德和国民党空军的渊源..... 王 倬(164)

程砚秋生平轶事..... 周云龙(170)

我国近代足球运动史话..... 蒋湘青(187)

上海孤岛时期的报刊..... 何国涛(211)

苏祖国与亚美公司

.....上海市机电一局民建支部、工商联工作组(243)

上海中法药房简史..... 谈玉林、钟信仁(253)

上海华美药房..... 孙德祥(266)

补白：一枚炮弹筒于 俊(71)

追忆孙中山先生若干事

田 桓

一、中山先生的日本朋友

孙中山先生日本朋友之多是众所周知的，如犬养毅、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大隈重信、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山田良政、福平诚、宗方山太郎、南方熊楠、日野熊藏、萱野长知、池亨吉、平山周、鎌田荣田、德川赖伦侯、坂本珍弥等，都与先生有一定友谊，其中与宫崎寅藏的关系最为密切。

一九〇〇年七月，宫崎寅藏自香港抵新加坡，准备规劝康有为与中山先生合作，但被人指控为刺客，而被英国殖民当局扣留。先生闻讯，立即赶往新加坡，设法营救。结果，当局勒令先生和宫崎限期离开新加坡。后来，先生致函宫崎寅藏说：“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人人皆为感激奋励。”

日本友人对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热情支持，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东京赤坂区日本子爵坂本珍弥的住宅举行的，同盟会成立不久，创办机关报《民报》，发行所的招牌就挂在宫崎寅藏住宅的门前。宫崎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简称滔天，对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专制，建立民国，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当时革命党人称他为民国恩人之一。

中山先生不仅在日本上层社会有许多朋友，而且和一般日本人民也极为友好，日本群众也都同情他，支援他。我曾亲眼见到日本人民欢迎先生的热烈场面。一九一三年二月，先生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考察。因为乘的是日本轮船，先在横滨上岸，其后乘火车到东京。许多日本朋友如宫崎寅藏等都赶往横滨迎接，我和中国留学生一起，也从东京到达横滨。在从横滨至东京的火车上，我向先生汇报了和朱克刚、张浩等在东京筹设国民党分部的经过。他问：“创办时遇到什么困难？目前有多少党员？”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连说：“很好，很好。”

车行极速，没有多少时间就进了东京车站。站上涌满了欢迎的人群，有的手举中日国旗，有的在帽上插了中日小纸旗，大家高呼“欢迎世界伟人孙逸仙！”“欢迎大东亚伟人孙逸仙！”“孙逸仙万岁！”等口号。在欢迎的人群中，有日本各界名流如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等，先生同他们一一握手。群众纷纷挤到先生面前，要求签名留念，有的准备好毛笔，放在自己大礼服的夹缝里，请先生签写“孙文”两字。东京车站的月台并不长，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出车站，真是寸步难移。

当天，先生下榻东京帝国宾馆，访问的宾客纷至沓来。先生指定我和戴季陶分别做接待工作，因为戴善日语，负责接待日本朝野人士，兼做讲演时的翻译，我则招待留日学生、华侨和党内同志。翌日，东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各大报纸，都以特大标题，刊载了先生访日的消息，记述颇为详尽，并夹有几张巨幅照片。

二、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

三月五日先生离开东京，在横滨、大阪、神户、宫岛、长崎等地

参观一周后，于三月二十三日启程回国。回国前，先生对我作了不少指示。他说：我不久还要来的。国民党这块招牌不行了，成员中蜕化变质的一天天增多，实在有愧于先烈，要纯洁组织，非彻底改组不可。将来到底用什么名称，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再同大家仔细商量。又说：南京国民党本部即将撤销，你们的东京支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过结束后，人事方面还得继续联系。

孙先生回国后，我仍留在东京，并遵照先生之命，结束了在东京的国民党支部。我无事可做，不甘寂寞，便与朱克刚等商量，发起了一个组织，定名为“科学研究社”，社员以原来东京国民党分部的党员为基础，推举黄申芑为社长。

黄申芑，湖北人，行伍出身，能诗善文，尤其擅长演说，清末时为日知会会员。武昌起义后，任湖北革命军第七混成协协统。是时，日知会另一会员孙武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两人有隙，黄申芑使用武力推翻孙武，自称为湖北军总司令，引起群情激忿，纷纷拥至督府要求都督黎元洪将黄捕杀。黎元洪一面下令通缉，一面暗中赠黄三万元，嘱其远赴日本，不了了之。黄申芑任科学研究社社长后，长袖善舞，大显神通，转眼之间，社员发展至一百数十人，初具政党规模。

一九一三年，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失败，袁于七月二十三日下令撤销孙中山的筹备全国铁路全权。八月二日，先生离开上海，经福州、基隆到达日本。接着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我虽为中华革命党筹备人之一，但革命党人对我另有科学研究社的组织，深为不满，严加谴责。丁景良说我是“叛徒”，苏曼殊说我是“奸细”，胡汉民也说：“党内无党，派内无派，加入其它组织，就是违反党纪。”中山先生知道我之所以组织科学研究社，是在国民党支部解散之

后，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前，并无对立之意，他和蔼地劝导我退出科学社。我即同朱克刚一起退出科学研究社，并带出一部分人，介绍他们参加了中华革命党。黄申芑为此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我捧他上台，又拉他下台，“不是好东西”。

这时，革命党重要人物，除汪精卫接受袁世凯的八万元贿赂正在遨游欧洲外，大部分都云集东京，参加中华革命党，只有黄兴与先生意见不一，暂不参加。其时居正住在京都，张汇滔住在长崎，先生派我为代表到新宿站欢迎居正，派我的哥哥田桐去东京东站迎接张汇滔。他们两人抵东京后，下榻于天健学社，天健学社一时成为建立中华革命党的主要场所。

中山先生命令筹备出版党刊，定名为《民国》，系月刊性质，租赁芝区南佐久间町的房屋为编辑场所，挂出了“民国社”的招牌，隔壁的一幢房屋，被名为“林蔚陆”，作为革命党人办公的地方。在左右约二百米的附近，又租赁了两栋房屋，作为招待所，一栋由田桐负责接待，被称为“大田寓”（因为中山先生称田桐为大田先生），一栋由我做接待工作，被称为“小田方”（因为中山先生称我为小田先生）。居正、夏仲民、萧萱、岑楼、陈冬青、曹亚伯住在民国社，其余党人如苏曼殊和天健学社同人分别住在大田寓和小田方。大田寓由管曙东司帐，小田方由凌昭和田青轮流司帐。大田寓每天总是食客满堂，如熊秉坤、阮复、吴醒汉、蔡济民、熊持中等几乎天天前来吃饭。先生说：“此可称为湖北饭店矣。”田桐系湖北蕲州人，听后心中不快，先生说：“这是戏言而已。”中山先生生平好客，喜留餐宿，甚至亲为客人送茶添饭，十分亲热。

中山先生眼见筹备就绪，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召开中华革命党预备会议，到会者二百多人，一致选举先生为总理。七月

八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到三百余人。大会规定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又按照入党时间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种，所有人员入党时必须立誓约，按指印，我也和大家一起，办理了入党手续。

中华革命党的办公地点，主要在民国社，总务部和军务部人员都住在那里。当时日本当局不许我们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对外，所以门口仍以民国社为招牌。其他如军务部、财务部的人员则在“林蔚陆”工作。《民国》杂志只出了三期，大家都要回国奔走革命，无暇及此，遂告停刊。民国社社址随之撤销，中华革命党本部搬至青山区，仍名曰，“林蔚陆”。“林蔚陆”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始终搞不清楚。

翌年，革命党人归国的越来越多，东京已经没有存在组织的必要，便将本部迁至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称为“中华革命党事务所”。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先生偕宋庆龄、廖仲恺、戴季陶由日本启程回沪，寓居于环龙路六十一号，即党本部的对门。后来先生夫妇迁至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即现在的“中山故居”。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白崇禧和杨虎、陈群派人将环龙路四十四号封闭，从此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就不存在了。

日人萱野长知著有《中华革命党》一书，记载极详，把各人所填的《誓约书》全部影印在册内，可惜我手头没有这本书。

三、建党中的一个插曲

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下设五部，由总理提名，推选陈其美为总务部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部长，许崇智、邓铿为军务部正副部长，

胡汉民、杨庶堪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财务部正副部长，我任总务部第四局（印铸局）局长。

除了本部以外，在各省分别设立分支机构，较大的地方设分部，小地区设支部。支部由分部管辖，也有直接隶属于本部的。各省分部部长，由各省在东京的党员中选举产生，对人选的要求极为严格，必须忠于党，有革命历史，在本省有较高的威望。

有湖南省党员陈家鼐者，是乙巳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陈家鼎的胞弟。此人有政治野心，善于钻营，见到在东京的党员不多，就千方百计拉拢一些与自己有关系的同乡介绍入党。当时大家都认为他热心党务，其实他另有企图。他未经本部许可，擅自用个人名义，召集有关党员开会，选举他为湖南省分部部长。

本部得讯以后，认为陈家鼐的行为触犯党纪，但他手下有一批喽罗，如果采取断然处置，深恐发生事故，于是先生决定暂时淡然处之，等条件成熟时再讲。当时我任印铸局局长，陈英士叮嘱我不要为陈家鼐刻公章，接着先生也交来了一张手谕，上书：“湖南省分部印缓刻，文。”陈家鼐常来找我，要我赶快刻制湖南省分部公章，并送给我白兰地、巧克力、高级饼干等物。为免事态激化，我都予接受，对刻印事则借故拖延。后他又邀我到会芳楼吃饭，我婉言拒绝。

不久，居正以本部党务部名义发出通知，内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召开湖南省全体党员大会，并进行选举。陈家鼐接到通知后，大为恼火，立刻赶到民国社，大骂居正，准备挥以老拳。这时，陈冬青适在陈的背后，赶快把他拦腰抱住，居正举起板凳在陈家鼐头上敲了一记，又打了两拳，陈家鼐因被陈冬青抱住，无法回手，被打得头皮出血，咆哮不已，声言决不甘休，但居正已去如黄鹤。

事后居正将前后经过面告中山先生，陈家鼐旋也赶到，居正退

藏于隔壁房间内，陈不知居已来过。先生见陈脸上有血痕，便问：“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陈答：“是被居正打的。”先生说：“现在还打人么！打人是野蛮行为。是不是你先动手打他，而他因自卫才打你的呢？”陈说：“先生可以找居正来，看他有没有伤。”先生说：“照这样讲，你是吃亏了，我不能让你吃亏。明天，你和居正都来这里，请陈英士为你们仲裁，决定谁是谁非，这也算是帮你申冤吧！”陈家鼐赶忙说：“这不行，英士与居正是一党。”先生风趣地说：“他们两人是一党，那么你是哪一个党的呢？难道大家都不是中华革命党党员么？叫英士做仲裁，既然不行，那末你只好自己去打居正了。”陈说：“居正的人手多，我打不过。”先生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说叫我怎么办？”陈说：“请先生替我作主。”先生笑着说：“看来，你是想叫我打居正了。我是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统，不能随便打人。总统打人要支付代价的，打一记，要付一万元，多打则以此类推。你想，你或我手头能有这么多的钱吗？”中山先生的一场打趣，说得陈家鼐哑口无言。“捉鸡不着落把糍”，陈家鼐不仅没有做到湖南省分部部长，而且被白打了一场。

四、民智书局的由来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中山先生在广州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表通电，表示“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二十日，国会举行非常会议，悍然废除大元帅制，改用合议制，选举岑春煊、唐绍仪、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唐继尧七人为政务总裁，并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五月二十一日，先生离开广州，随行的有朱执信、叶夏声等人。六月二十六日抵达上海，寓居于环龙路六十一号。在这一年内，他

深居简出，闭门著书，写成了《建国方略》一稿，并由胡汉民、廖仲恺、田桐、萧萱、邹鲁等分别抄写整理，作为定稿。

该书定稿后，曹亚伯见到，极为高兴，对先生说：“应该赶快付印，以飨国人，让读者先睹为快。”先生说：“好，那么交哪一个书店印刷呢？”曹说：“上海最大的书店是商务印书馆。”先生就叫曹亚伯携带《建国方略》原稿到商务印书馆联系。该馆人员把稿件翻来翻去，知道是革命党的著作，露出不欢迎的表情，说：“让我送给编辑处看看。”他把原稿拿进去以后，一会儿就出来对曹亚伯说：“商务印书馆不出这样的书，你拿给别人家去印吧。”曹说：“你们是营业性质，我们一样出钱，为什么拒绝？”那人说：“营业有营业的自由，不印孙文的书是我们的自由，有何不可！”

曹亚伯见无理可讲，便忿然归来，先到环龙路中华革命党事务所。这时，我正在与孙镜（字铁人）聊天，曹气冲冲地说：“我在商务印书馆碰了一个大钉子”，就把事情的经过对我们讲了一遍。我说：“你的主意出的不好，商务印书馆里有许多人是封建头脑，先生是革命党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他们怎么肯印革命者的书？今天不把你打出来，已经很好了，你赶快去汇报先生吧。”

曹亚伯向先生汇报后，先生大怒。第二天，本部同人晋谒先生，谈及此事，有人主张对商务印书馆进行报复，在社会上宣传该馆出版的教科书如何如何不好，让它的营业一落千丈，并建议由田桐主持其事。先生虽然余怒未息，但对此并未表示意见。田桐说，商务印书馆以牟利为目的，我们革命党人天天考虑国家大事，尚嫌精力不济，哪有功夫顾及这些小事？先生同意田桐的见解，劝大家说：区区小事，我们不必多计较了。

从商务印书馆这个事件中，先生认识到中华革命党有自办印

刷厂的必要，因为我们要出版的书刊很多，到处求人实属不便。于是先生就与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商量集资创办一家书店，大家表示赞同。先生提议定名为“民智书局”，派林业明（焕廷）为总经理。后来，民智书局出版了《建设月刊》，并发行了许多书籍，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民权初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等等，在北伐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田伯炎整理）